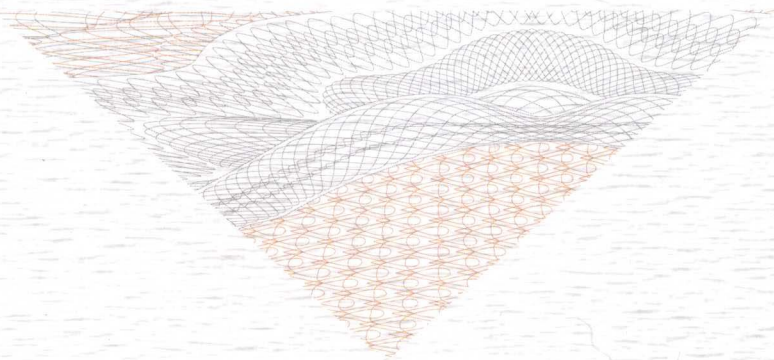


BAINIAN ZHONGGUO JINRONG
SIXIANG XUESHUOSHI

百年中国 金融思想学说史

第一卷
(上册)

顾问 黄达 刘诗白 孔祥毅 刘方健
主编 曾康霖 刘锡良 缪明杨



 中国金融出版社

BAINIAN ZHONGGUO JINRONG
SIXIANG XUESHUOSHI

百年中国 金融思想学说史

第一卷

(上册)

顾问 黄达 刘诗白 孔祥毅 刘方健

主编 曾康霖 刘锡良 缪明杨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戴 硕 董 飞

责任校对：孙 蕊

责任印制：裴 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 (Bainian Zhongguo Jinrong Sixiang Xueshuoshi) / 曾康霖, 刘锡良, 缪明杨主编.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5049 - 6095 - 5

I. ①百… II. ①曾…②刘…③缪… III. ①金融—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F8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3418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天津市银博印刷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尺寸 169 毫米 × 239 毫米

印张 67

字数 950 千

版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38.00 元 (上下)

ISBN 978 - 7 - 5049 - 6095 - 5/F. 5655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序一

金融学科源远流长。金融学科的建设，概括地说，是整理人类自古及今，包容中外所有金融真知的过程。中国的金融学科建设有着自己的曲折萦回之路。

东方、西方的古圣先贤都有蕴含着金融真知的至理名言。我国先秦、汉初诸子有关货币金融的见解透彻、精辟，至今依然熠熠生辉。可惜的是，社会的长期停滞，后人只会反复引述古训而踏步不前。西方却在走出中世纪之后，伴随着现代经济的萌生，逐步形成了服务于现代经济的经济学。19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面世，其中金融理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对环绕货币诸古老命题的透辟论证；也有对金融危机、资本市场等的探索和瞻望。许多论点，其历史的穿透力令人折服。

19世纪后半叶，货币论、银行论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货币银行学则成为一门重要的课程走上大学讲堂。也就是在进入20世纪，我国游学于西方的学子，把引进金融学科作为传播先进文明的重点，做了大量工作。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二三十年间，西方有关经济学科、金融学科的进展，在一两年、两三年之后，就会在中国的大学讲堂上讲授，就会有编译或翻译出版物出现在书肆上。而结合中国实际的研究，

注：2011年6月1日，黄达教授在“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授予他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的颁奖仪式上做了发言。他希望把这个发言的基本内容作为本书的序言。其中最后两段，是采用为本书序言时，黄达教授把颁奖仪式上原来准备讲述而压缩的内容重新补充而成。

则反映着中国学人在世界金融学科建设史上所作出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解放战争打断了金融学科的引进过程；而新中国的建立，则改变了引进的方向：即戛然关闭了引进西方的门户转而全面引进苏联。

对于这段历史，似乎有一种任凭岁月磨灭记忆的趋势。但这是历史的一个环节，不能忽视。建立计划经济，必然要引进服务于计划经济的金融理论和实务；而这样的金融理论和实务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恢复遭受连年战争摧残的经济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计划经济中既然不能取消货币，不能没有银行，苏联的金融学科事实上就不能不包含金融学科的基本原理。

在单方面引进苏联和闭关锁国的背景下，中国人，包括学界、业界和政府有关人士，对于金融学科建设也有着自己独立的贡献。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3月，我们一举制止了延续十多年的极端恶性的通货膨胀。那时没有洋人顾问，也没有国外援助，而是依靠澎湃的革命政治热情，最经典地运用了经济学的供求原理，实现了稳定的目标。再如，当宏观稳定一再受到冲击的背景下，我们发展了最初以“财政、物资、信贷三平”论断所提出的宏观均衡理论。这既不是来源于西方，也不是来源于苏联，而是自己憋出来的理论。又如，在经济技术条件极其落后的条件下，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就在整个大陆建立了极为通畅的通存通汇制度。这说明在金融实务的理论上我们也不是没有值得总结之处。这一切，对于全国金融队伍，在改革开放后吸收西方金融学科建设的成果，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基础。

33年前的改革开放重新打开了从西方引进的大门。引进是迅速的、热情的。但是要把已经隔绝多年的西方金融学科思想语言表达系统与我们计划经济中的金融学科思想语言表达系统交汇、衔接需要一个过程。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我们还是处在摆脱苏联框框的过程之中。而且，在那时，我们引进的主要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金融学科建设的发展成果，即宏观经济分析为主的货币银行学。这是我们能够比较容易迅速

吸收的内容，也是当时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至于对西方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快速发展起来的现代金融学，则没有同时大力引进。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进入金融学科领域的人们基本没有接触过这一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从海外游学归来的学人也不熟悉。同时，改革开放头十几年，资本市场还没有恢复，也缺乏实际生活的推动力。其间，有一批理工科人士出国作访问学者，学习到国外一些关于风险度量、风险管理的新知识，但他们不熟悉中国的金融实际，引进了，可是接不上轨。90年代中期，一些改革开放后出国的学子归来了，现代金融学才真正有系统地引进中国。伴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日益与国际衔接，引进后以极快的态势扩展，并一度有现代金融学才是科学的说法。今天看来，西方金融学科全面发展的内容我们已经可以及时了解并引用在我国的金融学科建设之中了。

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金融学科建设不论如何曲折萦回，基本属于“引进”型。这是必然的，抵触只能陷入固步自封，但引进必须正视消化吸收。从19世纪“西学东渐”以来，“食洋不化”一直是引进的大敌；不过与之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更始终是一贯的优良传统。金融领域的基本原理，中外一理；基本规律，全世界是同一的核心内容。但在中国，有中国的现实，有中国的历史传统，有几千年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习惯和心理素质，原理如何表现，如何用同一的理论指导中国的实际，这不能不与外国有所区别。美国人写金融著述，直截了当就是以美国的实际为背景，讲美国的故事。在他们看来，美国的也就是世界的。而中国人要在中国传播、建设具有世界意义的金融学科，当然要讲世界的背景，但对象是中国人，是为了指导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金融，那就不能不交代清楚中国有关的历史和现实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同于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度的特点。于是既要讲世界的故事，更要讲中国的故事。把握世界一理的基本原理，理解全世界的发展趋势，不是容易的事；把握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其实也同样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总有一种感觉，与世界发达国家比，与一些发展中国家比，中国人生活的实在是太辛苦了。历史铸就，无可埋怨。

但也可以说，这是我们的福分。

金融学科的建设，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鼎力推进的事业，其进一步的跃升，势所必然。过去百余年来，中国人对于金融学科的建设，间或有自己创新的亮点，但影响极难越出国境。当今，中国元素，在国际经济、国际金融的舞台上已然有着越来越难以忽视的权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学科建设也必将为世界金融学科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黄达

2011年8月

序二

到2011年10月，辛亥革命已历经100周年。在这100年中，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三是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政治、社会发展的基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回顾辛亥革命100年来的中国金融业发生的重大事件，总结百年金融思想学说史，活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研究，以国际化为重点，推进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中华民族的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背景下，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刘锡良、缪明杨教授编写出版了《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这是对我国金融理论研究有贡献的一件好事。经济决定金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金融是由货币、经营和管理货币的企业、金融产品交易市场、金融调控和监管、金融开放等几个重要环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正常运行，对经济发展发挥着杠杆作用。研究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就是要在研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针对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发展重要阶段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发展事件，归纳和研究当时国家财政金融界决策人、众多金融专业学者和重要金融机构代表人物对这些事件的主要观点。要达到这个标准是很不容易的。《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第一卷共设50章，选择这个时期50位各种金融代表人物，对其有关货币、金融企

业、金融市场、金融调控和监管、金融开放等的观点论述有选择地进行重点介绍。我对这种编写方法十分赞同。对过去 100 年中国发生的重大金融事件和各种代表人物的学说观点，如何归纳和研究，各方面会有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应欢迎和支持有条件有兴趣的学者深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最重要的是，曾康霖、刘锡良、缪明杨教授编写了《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各方面研究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提供了方便。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会在活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研究、促进我国金融业进一步改革开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自辛亥革命至今 100 年，可分为三个时期：1912—1949 年为民国时期；1949—1978 年为新中国改革开放前时期；1978 年至今为改革开放时期。《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对上述 3 个时期发生的金融重大事件和代表性人物的主要金融观点进行了归纳，并进行了研究。

1912—1949 年的民国时期，经历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和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这个时期除 1927—1937 年政治、经济较为稳定，金融业正常迅速发展外，其余时段一直处于内战和抗日战争之中。当时的中央政府集中金融业管理权和金融资源为其政权巩固和战争服务。尽管如此，这个时期金融思想发展和学术研究的领域十分广阔，内容也十分丰富。1914 年 2 月 8 日，北洋政府颁布了《国币条例》和《国币实施细则》，正式宣布中国实行银本位制。1933 年南京政府宣布“废两改元”。1940 年开始，中国发生严重通货膨胀，1948 年恶性通货膨胀加剧国民政府崩溃。在这个时期，金融思想学说讨论集中围绕是否建立金属本位制、纸币制度的改革、如何反通货膨胀等几个主题进行。在一系列货币改革过程中，一些学者认识到银本位制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理想的货币制度应当是实行纸币。法币改革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纸币政策的开始。法币政策实施后，学者们开始着重探讨纸币政策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问题。他们认为，法币政策是开中国货币制度的新纪元，但也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基础条件。通货膨胀可能由财政膨胀造成，在财政收支不能平衡的情况下，通货

数量随财政亏空的情形而伸缩，通胀就将成为现实。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受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货币政策要依附于财政政策，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刻板，难以发挥资金融通的活力，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边倒、学苏联的思维模式下，对金融的认识，划分为“资本主义的货币流通和信用”和“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和信用”。在这个阶段中，对存在的一些金融理论、金融现象采取批判的态度，比如通货膨胀，教科书就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强调它的阶级性和剥削性，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产生通货膨胀。但值得肯定的是，在这个阶段，也有一些中国金融学者在金融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货币、信用、银行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说和探讨，对经典理论的发展和深化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结合中国实际，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银行工作进行了研究，例如一些学者提出了财政信贷综合平衡、财政信贷分口管理与综合平衡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思想和主张。不可否认，这些研究对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业发展的实践推动激发了金融理论创新热潮，并进而形成了金融思想与金融改革的良性互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是邓小平为明确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提出的重要金融思想。1991年初，邓小平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践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这一精辟论断，把金融定位于“经济的核心”，科学总结概括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明确界定了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刻阐明了金融与经济的本质联系，为我们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现代金融奠定了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在金融领域值得回顾的与金融制度改革开放有关的学术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大财政，小银

行”的讨论。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提出：“银行应当抓经济，现在仅仅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要把银行当做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有学者于1980年10月发表了《现行财政银行体制需要改革》的文章，文章强调，把我国银行的地位和作用称为“三大中心”是不够的，“银行是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者”。文章引起业内人士和高层领导的震动，引发学界的争论，这场争论促进金融包括银行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二是关于发展商品经济与银行改革的讨论。这场讨论主要涉及中国应不应当成立中央银行，成立什么样的中央银行以及银行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这场讨论对国务院在1993年颁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的金融改革目标要建立和完善“三个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关于金融改革突破口和经营管理货币机构的“企业化”的讨论。通过这场讨论，推动了金融机构企业化和金融商品交易市场的改革步伐。四是关于金融改革应超前、应延后、还是同步进行的讨论，促进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进行。五是中国金融业要不要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讨论。21世纪初，不少准备上市的商业银行都从海外引进战略投资者，引发了业界热烈讨论。主张引进者认为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有利于扩充资本，吸取管理经验；不主张引进者认为这样做导致国家金融利益的流失，不利于国家金融安全。也有一些专家和实际工作者认为，对引进战略投资者不应一概排斥，也不应一律引进。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让大多数人统一认识还需要时间。上述问题的讨论，丰富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思想理论，促进了我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

1992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步骤和重大内容。在这以后，金融理论研究随之深入，但是，全社会及金融系统更加注重金融改革的实践活动，对这些影响中国乃至国际金融发展的金融实践应该进行理论总结。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卓越成就。一是人民币币值稳定。近20年中，除1993—1995年

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物价上升超过 10% 外，其余 17 年物价上升绝大部分控制在 5% 以下，特别是近 10 年物价年均上升 2% 以下。二是建立了多种金融机构组成的多层次金融组织体系。国有控股的四大商业银行已先后上市，市值位居世界上市公司前列。三是建立了多种产品的金融市场。2010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市值已列世界第三位，IPO 总量列世界第一。四是金融调控和监管已基本达到世界水准，有些方面可以说已超过欧美发达国家。五是金融开放度已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承诺。国际收支中的资本项目收支，共分 7 大类、43 个子项，到目前为止，其中可兑换或基本可兑换项目已占全部项目的 60% 以上。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开放，为中国的迅速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为全面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作出了贡献。

我认为，在研究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的过程中，要注意总结近 20 年我国金融改革和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基本经验。一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制定和执行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方针。邓小平思想中的金融论述，为金融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及国务院一系列文件，明确了金融改革方针、目标和主要任务。二是坚持循序渐进的改革发展原则。中国金融业发展沿着一条正确轨道稳步前进，没有走大的弯路，为金融改革节省了时间，降低了改革发展的成本。国有银行业改革，经历了专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国有控股上市商业银行四个阶段。中央银行改革，经历了将中国人民银行对企业和个人办理的货币信贷业务划出成立国家专业银行、将其按省设立分行改为跨区域设立一级分行、将其对银行业监管划出成立专职监管机构三个阶段。实践证明，上述改革是稳健、积极、有效的。三是党中央、国务院对金融业改革开放实行坚强领导。1997 年、2002 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研究和解决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四是及时制定对金融业的扶持政策。1998 年国家发行特别国债 2 700 亿元，用筹集的资金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1999 年成立 4 家资产管理公司，为国家银行剥离不良贷款 1.3 万亿元。2003 年开始，通过中央银行再贷款和中央财政资金向国家银行注资约 1.8 万亿元。地方政府向中央银行借款 1 400 亿元，

用于被关闭地方金融机构支付自然人合法债务，上述借款已有一半以上归还中央银行。采取这些救助措施是必要的，是获取金融改革丰硕成果必须要支付的成本。10多年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面临技术性破产的严峻挑战。10多年后，到2010年，我国银行系统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比例已降到1.14%，资本充足率达到12.2%，资本利用率达17.5%。4家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上市后不久已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采取改革、管理、监督、救助等综合措施，不仅化解了我国多年积累的金融风险，也促进了我国金融业市场化、国际化的改革，也为国际社会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改革开放积累了经验。

当《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出版发行时，我国已进入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美国和欧元区正在发生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此时，我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量占世界十分之一，外汇储备占世界三分之一，中国已成为全球金融最大的债权国。同时，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也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突出问题。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正在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每时每刻都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每时每刻都要提高我国金融业市场化改革水平。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创造条件，用好已经具备的条件，加快我国金融业走向国际的步伐。这样做，不仅是我国金融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需要，也是我国在新的形势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我认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点，已从集中化解金融风险、完善国内金融体系，逐步转变为以国际化为重点，努力提高我国金融业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为此，我建议金融理论工作者和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者，要关注和支持金融理论研究，围绕国际收支平衡、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培育大型综合性金融集团、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等重大课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为促进我国金融业面向全球的改革开放作出贡献。

2011年8月

绪言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参照这位明代思想家杨宗气的名言，我们也能够说“治学问者，以史为基”。因为，“了解历史的变化是了解这门科学的一个步骤”（李文林：《数学史概论》陈省身题词，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的出版问世，自然有助于后人治学。但是，研析历史，也许更为重要的意义乃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新唐书》卷一一零·列传第二十二·魏征）。触动我们编著这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金融思想学说史的动因就是：为了彰显中国人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展现的金融智慧；为了展示业内人士在推动金融事业和金融学科发展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为了能使后人了解和把握前人在金融领域中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值得学习、思考、参照的精神财富。

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总是因袭相承的，金融学科的存在和发展也必须承上启下，本书的出版问世，就是为了让金融思想学说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不致“断档”，就是为了在考察金融学说在世界各国的存在和发展时，中国不致“空白”。所以，《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不只是向国内人士展示在这个领域发展中前人的所想、所为，而且能够在世界面前展示中国人在这一领域的睿智。诚所谓“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四部丛刊本《定盦续集》卷一）。

(一)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治史永远是往复不已、从头开始的。历史永远在修撰中，永远在推陈出新。史学的命运与人类一切科学的命运无异”（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第7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中国自古就有后人为前人修史的传统，为的是让事物的发展有个回望的驻点，让过程的描述尽量符合实际，让功过是非的评价有更加客观的依据。但修史之事未必一定留待后人去做。历史是人写的，社会的人总有立场、观点、方法，如果后人对史料的把握有局限，则做出的叙述和评价就会有局限、有倾向性，甚至有偏见。再说金融思想学说史与金融业发展史应当有所不同：金融学说史是对金融理论发展的沉淀和概括，而这需要业内人士的共识，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需要社会的评价；金融业发展史是对金融业发展状况的叙述和概括，而这不需要业内人士达成共识，不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也不一定需要社会的评价，因为金融业发展史已经是过去发生了的事情，是既定的事实，而思想学说史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它是对人的思想、理论主张的叙述和概括，其叙述和概括既能反映在书面的表达中，也能反映在思想和言行里，对其意义和精华的理解往往需要提出佐证、阐释。所以，金融思想学说史的研修，一定都让后人去做未必完全正确、适合。而且事实上，已出版的西方金融学说史中已经纳入了当事人还健在的内容，例如，当时健在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现在依然健在的哈里·马柯维茨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等。

(二)

鸦片战争，门户开放，列强入侵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其中包括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和发展的经济学也进入中国大门。1901年，严复翻译

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伴随着《国富论》的出版，逐步推进了中国经济学科学的近代化进程。早期中国人自己著述的经济科学多偏重于财政金融。有资料记载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有近20部经济科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占2/3，多属财政金融类，具有代表性的有1911年梁启超著的《中国国债史》和吴琮编著的《比较预算制度论》。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基于当时中国政府和部分外国政府负债的状况，评析了国家负债与宪政的关系、国家负债与租税之性质异同、国家负债之轻重负担、国家负债与财政预决算、国家负债与公众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地方负债与中央负债的关系等。据此，我们能够说它是我国第一部金融思想学说史的专著。所以，选择这一百年评介中国金融思想学说，不仅表明中国金融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要借助于西方经济学科的推动，而且也是对历史的尊重。而金融业发展的过程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中国进入了民主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有相当的发展，1928—1936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事业逐步兴起，现代银行开始出现。中国学者在推动金融事业兴起方面，贡献了智慧、思想和理论，提出了有利于金融事业发展的政策主张。值得提出的是，在这一百年中，历史的天空并不平静。概括地说：辛亥革命以后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几乎战争不断；而解放以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几乎运动不断。

战争改变政治经济格局，给人们带来灾难，也给人带来启迪；运动给一部分人带来冲击，且事前、事中虽然束缚了人的思想，但事后则让更多的人思考。特别是中国提出改革开放以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给学术界带来了科学的春天。金融界在阳光雨露的照护下，呈现出学术的繁荣。我们选择这一百年作为时空界线，研究概括代表人物的金融思想学说，就是要呈现他们度过的学术生涯，走过的研究历程，所取得的有价值的成就，同时要表明在中国，只要

在正确的、科学的方针路线、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是大有作为的，中国金融界蕴藏着丰富的聪明才智。借用爱因斯坦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目的在于用粗线条描绘出人类智力如何寻找观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联系。我们试图说明是什么样的动力迫使科学建立起符合于客观实在的观念”（A. 爱因斯坦，L. 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原序第1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

（三）

“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汉·陆贾《陆子·述事》）。梳理、撰写金融思想学说史，能够从纵向拓展，也能够从横向拓展。纵向拓展以学派为基础，横向拓展以人物为标志。《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的编著，是以人物为标志，以著述为基础，以学说思想、主张为线索，有选择地集中阐明其价值，而不是全面介绍代表人物在金融方面的所说、所作、所为，更不是简单地介绍实际过程。不是“述而不作”，而是“既述又作”。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我们选择了这一百年中金融领域的代表人物，选择的标准是：在学术思想上有较深的造诣和前沿；在从业、敬业上有创新和发展；在致力于改革上有领先思想和主张；是推动金融事业发展和金融学科建设的先知先觉者；其业绩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公认，并有相当的知名度。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选择了一百多位代表人物，对入选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进行梳理：概括其精华—阐述其背景—评价其价值。

清末大儒王闿运曾感叹修史之难，“不同时，失实；同时，殉情；才学识皆穷，仅纪其迹耳”，选择代表性人物是颇费周折的事情。需要说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被选入的代表人物，已度过了他们的学术生涯，现在仍在各自岗位上的，由于他们的学术生涯尚未结束，不宜纳入代表人物中；（2）还需要说明的是：被选入的代表人物，限于企事业单位的从事金融教学和科研的人员。应当说，不少没有专门从事金融教